

金门是福建移民台、澎的中转站*

□ 周雪香

摘要:金门诸岛位于福建南部出海口的咽喉位置,由福建南部到澎湖、台湾以及海外各国,必然要经过金门诸岛。明清时期,大量福建居民及部分广东移民正是经由金门前往澎湖、台湾从事垦殖,经营工商各业。与此同时,由于金门诸岛较靠近大陆,其移民与土地开发比台、澎地区要来得早。自明后期以来,迁居金门的福建移民及其后裔又陆续向澎湖、台湾本岛迁徙,金门成为福建移民台、澎的中转站。

关键词:金门;福建移民;中转站

中图分类号:K295.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04-0113-06

金门地处台湾海峡的西侧、福建南部九龙江出海口,包括金门岛(古称浯洲,俗称大金门)、烈屿岛(俗称小金门)和周边大担、小担、南碇、东碇等岛屿、礁岛、沙汕。金门岛与近在咫尺的厦门岛互为犄角,扞钥海门,控制澎台,阻扼闽粤,为漳泉海上门户,是福建向澎湖、台湾移民的中转站,在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金门在福建向台湾、澎湖移民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足够重视。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作些探讨。

一、金门是福建南部沿海通往澎湖、台湾的咽喉

金门诸岛位于福建南部出海口的咽喉位置,主岛西北距同安县治约40公里,西距厦门也是40公里,距漳州55公里,东北距晋江的围头约15公

里。何乔远《闽书》云:“浯洲西连烈屿、中左(指厦门岛),南达担屿、镇海,料罗尽其东,官澳极其北。虽土壤之广,金与厦共为海洋之锁钥、全邑之藩篱,而金尤要于厦也。”周凯《金门志·序》云:金门“其山川则有大武雄峻高耸,为贾舶往来之标准;其险则有料罗、塔脚,为商贾所停泊,渡台贩洋之所自。”明万历三十年腊月初旬(1603年1月),福建连江人陈第随浯屿水寨把总沈有容从征倭寇,由金门料罗湾启碇,直追倭寇到“东番”,“海波荡定,除夕班师”。陈第《东番记》载:“异哉东番!从烈屿诸澳乘北风航海,一昼夜至澎湖,又一昼夜至加老湾,近矣……倭破,收泊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夷目大弥勒率数十人叩谒,献鹿馈酒,喜为除害也。”明末,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作为抗清根据地。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也是从金门起航。据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2012Z002);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JA10005S)。

作者简介:周雪香,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台湾师范大学访问学者。

杨英《从征实录》记载,三月二十三午,大军从料罗湾启碇,“二十四日,各船俱齐到澎湖,分各屿驻扎。藩驻内屿(今马公市蒔里),候风开驾”。三十晚一更后,传令开驾,“四月初一日黎明,藩坐驾船即至台湾(今台南安平)外沙线,各船鱼贯络绎亦至。辰时天亮,即到鹿耳门线外”,由此登岸。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派施琅率兵统一台湾。根据《厦门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后,“船只往来,在内地惟厦门一口,与鹿耳门一口对渡”。“凡外洋渡台、南北商船出入,到关请验;米粟、书籍免税,余皆照则例征收。”当局还专设台防厅与厦防厅,负责稽查对渡等事务。厦门与鹿耳门之间的单口对渡维持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才增开台湾彰化鹿仔港与泉州蚶江口为对渡口岸;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允准台湾淡水厅八里坌对渡福州五虎门。清统一台湾后的一百年间,厦门不仅是官方指定的唯一渡口,而且还是偷渡的“总路”。当时渡台民人,“若由官渡,则必经官给照,海口查验放行,难免兵役留难勒索。而私渡只须与客头、船户说合,即便登舟载渡,其费较官渡为省,其亦较官渡为速。”因此,偷渡盛行。福建巡抚吴士功奏称,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月止,在11个月内查获偷渡案25起,老幼男妇999名,溺毙之男妇34名。^⑪这只是被官方查获的部分,其他私自渡台者“恐不知凡几”。首位汉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记载:“偷渡来台,厦门是其总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舡者,如曾厝垵、白石头、大担、南山边、镇海、岐尾;或由刘武店至金门、料罗、金龟尾、安海、东石,每乘小渔船私上大船。”^⑫同书又载:“厦门至澎湖,水程七更;澎湖至鹿耳门,水程五更……俱由厦门经料罗,在金门之南澳可泊数百船……”^⑬

由上述可见,在明清时期,从福建沿海经金门到澎湖、台湾,这是一条重要的航线,大量福建居民正是通过这条航线前往澎湖、台湾从事垦殖,经营工商各业。以台中龙井林家为例,其先世居于漳州府漳浦县乌石乡,迁台开基祖是林兴的

三子林良。林良迁台路线是先到金门,暂住在沙尾后坑(金门十七都汶沙保),后以金门岛小地瘠,谋生困难,转渡赴台,由中部的涂葛堀(今台中市龙井区丽水村)上岸,其迁台时间约在雍正九年(1731)至乾隆六年(1741)之间。林良去世后,其独子林三会迁居三块厝,后再迁到山脚(今龙井区山脚村),逐渐发展为龙井地区的大家族。^⑭又如澎湖瓦硐下乡李姓,据族谱记载:“世居金陵,至大明崇祯兵变,满人入关,我家被害惟尽。幸得家人负我始祖逃入汀州,后历金门,移居澎湖瓦硐。”^⑮

值得一提的是,黄钊《石窟一征》云:“往台湾者,例由本籍县官给照,至泉州厦门海防同知验放,方准渡海。然盘费过多,贫不能措者,往往在潮州樟林径渡台湾。”^⑯黄钊,号香铁,广东镇平(今蕉岭)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镇平县境有石窟河,故书名石窟,实际上是一部私家志书。根据黄著的记载,按当时政策,粤东居民渡台,需到厦门查验,因此一部分粤东移民也是“由厦门经料罗”这一航线前往台湾开垦。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广东潮州府饶平县林钦堂、林孙彰、林居震、林先坤四人自厦门渡海前往今彰化县鹿港镇开垦,后于乾隆十七年迁垦今新竹县竹北市,成为当地著名的大族,即“竹北六家林家”。^⑰

二、金门是福建向台湾、澎湖移民的中转站

由于金门诸岛较靠近大陆,其移民与土地开发比同属海岛的台、澎地区要来得早。道光《金门志》记载:“晋,中原多故,难民逃居者六姓(苏、陈、吴、蔡、吕、颜)。唐为万安牧马监地,德宗贞元十九年闽观察使柳冕奏置,从牧马监陈渊来者十二姓(蔡、许、翁、李、张、黄、王、吕、刘、洪、林、萧)。”^⑱对于晋时六姓难民逃居金门的说法,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似是而非”^⑲。1955年,金门曾发现古砖,据考古学家庄严先生鉴定,此类古砖系两汉至六朝时期的文物,而且在同一地点还陆续发现了不少,“花纹亦复不一”。^⑳这些古砖究竟是如何传入金门的,可否认为即是晋时中原难民的遗物,至今还很难做出确切的判断。关于柳冕奏置万安监的事迹,两唐书均有记载。陈渊到金

门牧马,一方面带来了一批将士到岛上拓荒,建立营寨,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移民奠定了基础,因此在金门开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91年增修的《金门县志》,共记载了81个1949年以前迁入姓氏的来源和迁徙情况,晋代六姓难民与从牧马监陈渊而来的十二姓的后裔均已无法稽考;目前年代最早的姓氏只能追溯到唐末由河南阳翟迁入的陈氏。在81姓160多个支派中,有70个姓氏、120多个支派是明清以后才迁入。^①这81姓主要迁自泉州府所属的同安、晋江、南安、惠安和漳州府所属的漳浦、海澄等县,亦有部分来自莆田、永春、福州等地,甚至外省。根据金门学者对这81姓186个迁移事例的统计,其移民祖籍地分布如下:来自泉州府者135例,占72.6%;来自漳州府者16例,占8.6%;来自福建其他府者亦16例,占8.6%;来自外省者9例,占4.8%;另有10例难于稽考,占5.4%。来自泉州府的135例中,来自同安者56例,占41.5%;来自晋江者49例,占36.3%;来自南安者15例,占11.1%;来自惠安者12例,占8.9%;另有3例来自安溪,占2.21%。^②由此可见泉漳移民特别是同安(大体包含今厦门市所辖范围)、晋江(包含今泉州市区)移民与金门居民的血浓于水的渊源关系。

据成书于明隆庆二年(1568)之金门最早方志——《沧海纪遗》记载:“浯地隘而瘠薄,加以风沙飘压之患,民之有常业者无几。故或有煎晒而业于盐者,或有渔网而业于海者,或有杂作而业于庸者,保生盖甚难也。”^③地理环境的限制,加上明中叶以后倭寇与海盗的侵扰,明郑与清廷的攻守,因此,大陆移民迁入金门后,有的又分迁内地,或是向台澎地区迁徙。以内迁同安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由金门内迁同安者共有颜、杨、彭、张(3支)、陈(8支)、薛、王、吕、方、洪、蔡(2支)、刘、柯、黄(2支)、李、邵、许(2支)、梁等18姓30个支派,^④故有“无金不成同”之说。

澎湖早在宋元时期便有汉人定居岛上,明洪武年间,实施“墟澎”政策,将澎湖居民徙置漳泉间,墟其地。然其时内地渔户正苦于催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一《福建》云:“国初立河

泊所榷鱼利,遣校尉点视,以所点为额,纳课米。其后渔户逃绝。”因澎湖位于海中,催科所不及,福建沿海的逃亡渔户,逐渐又隐匿于其中。于是,澎湖又逐渐成为福建沿海渔民的移居地和渔场。万历九年(1581),有金门洪姓20余人到今澎湖县湖西乡尖山定居,以渔业及农业为生。^⑤万历二十三年(1595),福建巡抚许孚远建议澎湖设将屯兵,筑城置营,其疏云:“查澎湖属晋江地面,遥峙海中,为东西二洋、暹罗、吕宋、琉球、日本必经之地。其山周遭五、六百里,中多平原旷野,膏腴之田,度可十万。若于此设将屯兵,筑城置营,且耕且守,据海洋之要害,断诸夷之往来,则尤为长驾远馭之策。”^⑥此后,开始了澎湖群岛的第二次移民潮,不少金门居民因“家贫,走食于澎湖,岁数往返”,^⑦后来一部分人便在澎湖定居。史载:“澎在前朝(明朝)尝隶同安县辖,其居民亦多籍金门者。澎至厦门七更,其实抵金门之料罗汛不过五更;计程只三百里而近,莫不呼吸可通,宜其星野之无异也。”^⑧根据澎湖地区族谱及当地学者的田野调查资料,自明万历年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氏政权结束之前,迁入澎湖的移民共有26姓80个支派,其祖籍分布如下:

表1:明末、郑氏时期澎湖居民祖籍及入垦澎湖各地统计表

祖籍	马公市	湖西乡	白沙乡	西屿乡	望安、七美乡	总计	百分比%
泉州府	泉州府	2	0	1	0	3	3.75
	同安县	5	4	1	0	11	13.75
	同安县金门	13	13	14	6	49	61.25
	南安县	3	0	0	0	5	6.25
	晋江县	1	1	0	0	3	3.75
	合计	24	18	16	9	71	88.75
漳州府	漳州府	0	0	2	0	2	2.5
	海澄县	1	0	2	0	3	3.75
	漳浦	0	0	3	0	3	3.75
	合计	1	0	7	0	8	10
不详	0	0	1	0	0	1	1.25
总计	25	18	24	9	4	80	100

资料来源:1、颜尚文编纂:《续修澎湖县志》卷三《人民志》表2-13《明末、郑氏时期澎湖先民宗支与变迁表》,澎湖县政府2005年,第84-89页。该志书表2-1《1595-1683年澎湖先民祖籍及入垦澎湖各地统计表》中,籍贯“不详”者2,籍贯同安者14,籍贯金门者41,总数为76,与笔者统计略有出入。

2.黄有兴:《中华民族开拓台湾的第一站——澎

湖》,《台湾文献》32卷1期,1981年3月。

3.许雪姬:《澎湖的人口迁移——以白沙乡瓦硐村为例》,《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24),1988年,第64—67页。

4.胡生万:《胡氏族谱·序》,1973年铅印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微缩资料,编号:1418937。

由表1可见,明末及郑氏时期移入澎湖的居民,主要来自泉州府和漳州府,其中泉州府籍的移民占总数的88.75%,漳州府籍仅占10%。尤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同安县金门的移民占了移民总数的61.25%;其次是来自同安县其他地方的移民,占13.75%;两者合计占移民总数的75%。清统一台湾后,又先后有金门居民吕氏和王氏于康熙年间相继迁入澎湖,黄仁长于雍正年间、郑彩、宋富极和蔡处士于乾隆年间迁居澎湖。^②故《澎湖厅志·风俗志》云:“按澎人多籍金門,亦有从同安、禾山、漳州来者,故其岁时伏腊,大致略同。”^③

据陈第《东番记》载,东番“居山后,始通中国,今则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以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④烈屿即小金门,有学者认为“惠民”之福州音近似“厦门”之闽南语发音,陈第系连江人操福州话,故“惠民”可能是厦门。^⑤依此,在17世纪前后,金厦附近岛民已浮海到台湾从事番产交易,至“往往译其语”。由于金门地小贫瘠,“下户之民,无尺寸田地者,十有八九也。其生计所赖,专在于渔,故常穷日夜之力,而直抵于汪洋之区”。^⑥渔业与金门居民的生计息息相关。金门居民先是到邻近的澎湖捕鱼,以后逐渐扩展到台湾本岛。学者研究认为:“自嘉靖末年以來,最迟是万历初年以來,大陆上已有許多商船和漁船,进入台湾本岛,南起北港,而北部一直到淡水、鸡笼。”^⑦根据《大员商馆日志》记载,在1637年前后,自大陆沿海地区到台湾的渔船,每年约有三三百至四百艘,渔人估计六千到一万人,以自烈屿出发者为最多,其次为厦门与莆头;商船有一百多艘,以自厦门出发者为最多,其次为安海、烈屿、广东、福州等地。当时的渔民都是要在进入渔

期后,方从大陆沿海地区来到台湾;渔期一过,便又回至家乡,故是一种季节性的移民。此种渔民停留在台湾的期间,大多是在渔场附近建立渔寮,暂行居住。而在以后却渐渐发展成为渔村;并且在渔人之中,亦有一部分停留稍久,而渐渐改变为定居者。^⑧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的《安平区采访记》云:“一、在安平的山仔顶,所见的累累坟墓,墓碑上所刻的地望,以金门、烈屿为最多,同安次之。二、以安平方言的声韵与台南比较,显然可发现很多区别,那些区别出来的声象,也正是同安县(古时包括金厦及其附近的岛屿,烈屿亦居其一)用语的特征。”^⑨安平是台湾开发最早的地区,其山仔顶坟墓的地望似可说明大小金门与同安等地的居民是汉人居留台湾的先声。清代乾隆、嘉庆、咸丰年间分别建于安平、鹿港和艋舺的“金门馆”,亦是金门渡台者留下的足迹。

对于福建移民经金门渡海赴台,我们可透过族谱记载进行考察。比如,最先入垦竹塹的垦首王世杰,据《金门王氏族谱学法公(浦边)裔派谱系》记载,浦边王氏是开闽王审知后裔,明代由同安迁浯江,后再由金城东沙分居浦边,王世杰即出生于此。^⑩康熙后期,^⑪王世杰“集泉人百数十人”,赴台湾竹塹埔开垦,开辟了南庄24庄、北庄13庄,“为田数千甲,岁入谷数万石”,^⑫在竹塹开发史上居功最伟。

又如著名的新竹北郭园郑家,据《浯江郑氏族谱》记载:郑家先世为漳州府漳浦县人,至郑怀仁(1623—1680)时,娶金门前湖乡(今泗湖)人陈进娘(1637—1705)为妻,由于“门衰祚薄”,^⑬奉母何氏栗主^⑭由漳浦迁至金门外戚家。其母何氏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卒于永历二十九年(清康熙十四年,1675),享寿七十四岁,葬在漳州大湖潭上;怀仁生于天启三年(1623),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由桑主进至栗主需要一年,据此,怀仁迁居金门的时间为清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之间。由于怀仁父亲以上名讳已无从查考,故后世以怀仁为始祖,而尊其母何氏为太始祖妣。^⑮怀仁独子世辉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享年八十三岁,先后娶金门山外人陈金娘

和金门坡海人黄安娘为妻,前后两位夫人生下五子:长房国周,传子四:崇华、崇大(承继国晋)、崇岳、崇有;次房国汉,传子二:崇佛、崇广;三房国晋,嗣子崇大;四房国唐,传子四:崇聪、崇志、崇吉、崇和;五房国庆,传子三:崇封、崇科、崇榜。第三世兄弟五人中,四房国唐及长兄国周、五弟国庆同由浯江迁居台湾竹塹。^⑬此后,郑氏族人相继迁台,如第五世郑用锡(道光三年进士)所撰《本族谱序》云,其父崇和“有志诗书,窃奉先公(国唐)家训”,后因“屡试不酬,且遭凶讎”,“与三伯(崇吉)及叔祖(国庆)渡台,寄居于台之淡北,遂入籍焉”。^⑭郑氏族人最初住在后垵(今苗栗县后龙镇),嘉庆十二年(1807),郑崇和始在淡水厅治竹塹(今新竹市)北门口水田街购屋住居。^⑮此后,郑氏族人除少数仍留居金门和后垵外,大部分聚居于竹塹北门。嘉庆中叶以降,郑氏族人经由营商谋利累积财富和栽培子弟博取功名而逐渐崛起,跃居社会上层,与板桥林平侯家、新竹林占梅家齐名,同为淡北最为显赫的三大望族之一。^⑯

再如原居晋江县乌石龟乡(今晋江市龙湖镇石龟村)的许氏族人,三世祖重助(生于顺治戊戌,卒于乾隆戊午,1658—1738年)移住同安县烈屿东林乡。至四世,由烈屿渡台,分支新竹后垵新港、彰化北投街(北斗镇)、南投等处。^⑰

其他如陈一贵(一桂),据族谱称,其妻郑细娘为郑成功之姑。^⑱永历十五年(1661),一家十三口随郑氏自金门碧湖(今金门县金湖镇湖前)迁台,居中洲庄(今台南市学甲区),成为该地大族,称为中洲陈氏。子孙分布于台湾南部,尤以今台南市佳里区、七股区为多。庄朴质,康熙十二年(1673),携子盛德自金门螺屿(即烈屿)渡海赴台,在台南洲仔尾(今台南市永康区盐洲里)登陆,后来迁居学甲。盛德娶洲仔尾人欧氏大娘为妻,生下六子,分为六房,繁衍为当地大族,子孙除了居于学甲新生里、宅港里、平西里、焕昌里、宜民里、美和里等聚落外,还散居在台南七股区永吉村(通称谓公宅仔)、安南区学东里(通称谓学甲寮仔)及台南市区、高雄市区、台东县等地。^⑲郑奇龙,雍正年间,自金门入垦新竹市一带。陈世栋,乾隆年间自金

门徙居台湾,遂开新竹之竹北东势一脉。^⑳李求,乾隆年间,自金门移至澎湖,属金门银同李氏,其子李换继而渡台,移居于今新北市淡水区。王团丹,乾隆中期,自金门入垦今台北市内湖区。^㉑据台中清水《李家族谱》记载,其开基祖李超亦来自金门,李超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其妻蔡快娘生于雍正七年(1729),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推测李超于乾隆年间渡台。^㉒

综上所述,由于金门诸岛位于福建南部出海口的咽喉位置,由福建南部到澎湖、台湾以及海外各国,都必然要经过金门诸岛。明清时期,大量福建居民及一部分广东移民正是经由金门前往澎湖、台湾从事垦殖,经营工商各业。与此同时,由于金门诸岛较靠近大陆,其移民与土地开发比台、澎地区要来得早。自明后期以来,迁居金门的福建移民及其后裔又陆续向澎湖、台湾本岛迁徙,金门成为福建移民台、澎的中转站。

注释:

⑳李仕德:《金门与早期台湾开发的关系》一文(刊于《台北文献》直字102期,1992年12月),对明清之际金门人移殖台澎作了概要性的论述,但其侧重点在于分析金门人移殖台澎的原因。

㉑参见谢重光等著:《金门史稿》,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第2、11—12页。

指镇海卫,明初所建,当时在漳浦县境内,今属龙海市。

㉒林焜熿纂辑、林子豪续修:《金门志》周序,卷二《分域略》。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5页。

㉓陈第:《舟师客问》,《东番记》,收入沈有容《闽海赠言》卷之二《记》,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28、27、26—27页。

杨英:《从征实录》,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85—186页。

周凯:《厦门志》卷六《台运略》,卷七《关赋略》。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86、197页。

㉔《台案汇录丙集》卷七《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闽督福康安奏折》,《吏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巡抚吴士功奏〉移会》。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255、239页。

㉕⑬⑭黄叔瓚:《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崁笔谈·武备》,卷

一《赤崁笔谈·水程》。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33、15页。

⑭参见许雪姬:《龙井林家的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6-40页。

⑮《澎湖瓦硐下乡李氏族谱》,转引自许雪姬《澎湖的人口迁移——以白沙乡瓦硐村为例》,《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24),1988年,第68页。

⑯黄钊:《石窟一征》卷三《教养二》,中国史学丛书续编(11),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第116页。

⑰⑮①庄英章编纂:《重修台湾省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第95、74、144、152、202页。

⑱②①郭尧龄总编修:《金门县志》卷三《人民志》,金门县政府1992年,第353、376-386页。

⑲②④参见蔡凤雏《由人口移动看金厦两地的亲缘关系》,收入周仪扬主编《谱牒研究与五缘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258、261-262页。

⑳㉓㉔洪受著、吴岛校释:《沧海纪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117、91、118-119页。

㉕台湾惯习研究会编:《澎湖岛沿革史》,《台湾惯习纪事》3卷12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7年中译本,第282页。

㉖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六《抚闽疏·议处海坛疏》59a,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刊本影印,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

㉗《澎湖厅志》卷十一《旧事·丛谈》,卷九《风俗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384页。

㉘颜尚文编纂:《续修澎湖县志》卷三《人民志》,澎湖县政府2005年,第90页。庄英章编纂:《重修台湾省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第150、378页。

㉙《澎湖厅志》卷十一《旧事·丛谈》,卷九《风俗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318页。

㉚曹永和:《明代台湾渔业志略》,收入曹氏著《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165页。

㉛曹永和:《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补说》,收入曹氏著《台

湾早期历史研究》,第213、219、234、252、249页。

㉜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编纂组:《安平区采访初录》,《台南文化》第3卷第3期,1953年11月,第57页。

㉝参见张德南《王世杰古墓碑文初探》,收入张氏著《新竹区域社会研究》,新竹市文化局2010年,第240页。

㉞王世杰开垦竹堑埔的年代,有“康熙三十年”、“康熙四十年间”、“康熙五十年代”等几种说法,张德南认为,应该采用陈朝龙总纂的《新竹县采访册》的记载“康熙五十七年王世杰开垦竹堑埔”。参见张氏《王世杰开垦竹堑埔年代的商榷》,收入张氏著《新竹区域社会研究》,新竹市文化局2010年,第81-85页。

㉟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一《王世杰列传》,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799-800页。

㊱④②④③④郑鹏云辑:《浯江郑氏族谱》第6a、60-61、75之一、6a页,1914年石印本。

㊲古礼,人死既葬,还祭于殡宫叫虞祭,用桑木作的神主。期年,练祭时埋桑主,改用栗木作神主。

㊳郑崇科:《立分给闾书字:郑崇科忆自金门四岁随父渡台》,由新竹市张德南老师提供复印件。

㊴参见蔡渊黎《清代台湾的望族——新竹北郭园郑家》,收入《第三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录》,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第546-553页。

㊵《许氏族谱》,修纂者未详,初修于大正六年(1917),1990年重修,由新竹市张德南老师提供。

㊶陈仁德编:《台湾中洲陈氏族谱》,1970年。

㊷庄景林:《学甲庄氏宗谱》,1983年刊本,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微缩资料,编号:1411463,第295、301-302页。

㊸陈进兴编:《金门陈坑、竹北东势八郎公宗派陈氏族谱》,台湾国民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3、29页。

㊹李文龙编:《李家族谱》,1974年写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微缩资料,编号:1392275。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张燕清)